



HAL
open science

Jilin sheng Da'an shi 2012-2013 nian quyuxing xitong diaocha jianbao 吉林省大安市 2012~2013 年区域性系统调查简报

Liu 刘晓溪 Xiaoxi, Pauline Sebillaud, Wang 王立新 Lixin

► To cite this version:

Liu 刘晓溪 Xiaoxi, Pauline Sebillaud, Wang 王立新 Lixin. Jilin sheng Da'an shi 2012-2013 nian quyuxing xitong diaocha jianbao 吉林省大安市 2012~2013 年区域性系统调查简报. *Bianjiang kaogu yanjiu*, 19, 2016, pp.27-45. <hal-01462114>

HAL Id: hal-01462114

<https://hal.science/hal-01462114v1>

Submitted on 25 Jan 2020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Distribut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 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吉林省大安市2012-2013年区域性系统调查简报

刘晓溪

史宝琳 (Pauline Sebillaud) 王立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春, 130033;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东亚文明研究所 CNRS-CRCAO, 巴黎, 75005)

为了践行2009年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2011年吉林省文物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成立了“吉林省田野考古实践与遗址保护研究基地”。根据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考古工作规划》的要求, 经由吉林省文物局协调,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1年7月初至10月末对后套木嘎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 在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收获的同时, 也使我们意识到“仅仅依靠单个遗址的发掘所获得的考古资料, 既不能使我们准确地概括一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特征, 也不能为我们探索早期复杂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提供足够的证据”[21]。藉此, 我们除了按计划对后套木嘎遗址进行为期5年的连续发掘外, 还计划分年度、分步骤地对以后套木嘎遗址为中心的新荒泡及月亮泡周边区域3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进行区域性系统调查。“区域系统调查, 又称作全覆盖式调查, 是以聚落形态为目的的考古调查方法”[3]。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调查方法, 并配合以典型遗址的发掘, 进而构建和完善嫩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 并尝试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分布、聚落形态历时演变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2012年4月25日至5月10日和2013年4月25日至5月11日, 后套木嘎遗址考古队连续两年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区域性系统调查, 截至目前, 以此种方法进行的考古调查工作在吉林省境内尚属首次。

一、拟调查区域的自然地理概况

松嫩平原系由松花江、嫩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 其东、西、北三面分别被长白山脉、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所环绕, 形成了一个相对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拟调查区域位于嫩江西侧支流洮儿河的下游地区。这一带历史上由于水流不畅形成过众多大大小小的湖沼, 现存水域较大的有月亮湖、新荒泡、他拉红泡等。

该区域从整体上看地势较为低平又略有起伏, 海拔120—150米。按地形地貌和地表植被的差异又可以细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相对地势较高的河床两岸和湖泊周围的台地或土岗, 土壤类型多为略偏沙性的黑土或灰黑土, 堆积厚薄不均, 现多辟为耕地, 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 多数地区已呈现沙化; 第二类为相对地势较低的旧河床、干涸的泡子底部或洪水泛滥区, 历史上应为水草丰美、面积广阔的湿地, 由于近年来人为破坏和干旱气候的影响, 形成了成片的植被稀疏、生态脆弱的盐碱地带。

二、以往工作简介

嫩江流域考古工作起步较早, 自20世纪30年代初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4]算起, 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 黑龙江、吉林两省的文物工作者在昂昂溪文化认识的基础上, 对嫩江流域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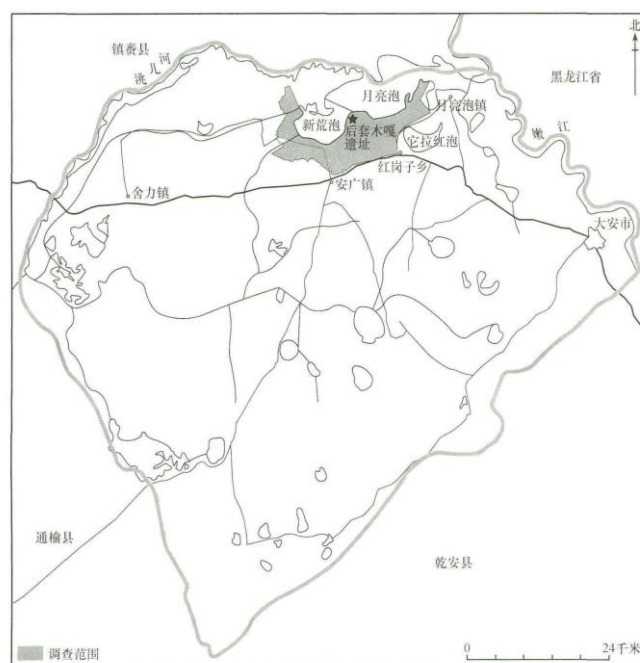
工作。调查工作包括黑龙江省博物馆 20 世纪 60 年代对嫩江沿岸的调查[5]、70 年代对昂昂溪遗址的调查[6]，吉林大学 1962 年对白城地区的调查[7]，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1982 年对洮儿河下游右岸的调查[8]等；发掘工作包括耙山墓地[9]、黄家围子遗址[10]、小拉哈遗址[11]、白金宝遗址[12]、汉书遗址[13]、双塔遗址[14]等。通过这一系列考古工作的开展，获取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为嫩江流域汉以前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后套木嘎遗址周边 300 平方千米的范围仅为整个嫩江流域的一小部分，单就这一区域而言，最早的考古工作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58 年吉林省博物馆和文管会对后套木嘎遗址进行了调查[15]；1962 年吉林大学在白城地区进行调查时，调查了该区域内的东山头遗址、傲包山遗址（即后套木嘎遗址）、邹德仁屯遗址，并对东山头和傲包山遗址进行了试掘[16]；1974 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2001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大安汉书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17]；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自 2011 年以来后套木嘎遗址连续发掘所取得的收获，为整个嫩江流域汉以前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认识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标尺[18]。

三、工作基本情况、调查方法介绍和说明

（一）基本情况

2012-2013 年的调查工作范围主要位于新荒泡及月亮泡的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涉及的主要行政区域有隶属于大安市的安广镇、丰收镇、红岗子乡和月亮泡镇，调查面积总计约为 116.64 平方千米（图一）。



图一 2012-2013 年调查范围位置图

（二）调查方法介绍和说明

首先将参与调查工作的人员分为若干组进行拉网式调查，每组 3-4 人，全程步

行,保持人与人间距50米左右。由于最后的分析都是以采集区为基本单位,所以采集区范围的划定和采集遗物的方法就尤为重要。采集发现陶片两片以上即作为一个采集区,采集区的规格为50米x50米。同时根据地表遗物的丰富程度选择做一般采集或系统采集。

一般采集系在地表遗物相对稀疏的情况下,又对整个采集区内所有遗物做全面收集;系统采集是在地表遗物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在采集区内画一个或多个(不超过五个)半径为1.8米的圆圈(面积约10平方米),圈内所有遗物做全面收集,系统采集的遗物数量整体以不少于30个为标准。每个采集区内采集到的遗物均代表着该采集区内遗物的文化属性和分布密度,采集区的数量往往是与遗址的面积相对应的,实际上绝大多数采集区内采集到的遗物都包含着不同时期文化的陶片,通过对采集区这一基本单位内采集遗物的分析,我们可以在未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对一个遗址内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和密度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调查过程中,除了严格按照既定的调查方法外,我们还利用了电子地图的导航功能对发现遗物的地点进行定位,同时与手持GPS测得UTM坐标进行比对和校正,用测距仪在现场划分采集区范围并进行遗物采集,根据采集过程行走路径,在已经准备好的大比例尺卫星图上精确找到采集区的位置,并作出明确标注,最后在野外现场填写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中的相关表格。

室内工作则充分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对田野调查工作中所采集到的遗物进行分析和断代后,将分析结果和田野调查过程中的记录表格、照片等文字和影像资料,输入到利用Filemaker软件建设的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中[19];将画在卫星图上的采集区等图形资料利用AUTOCAD软件在已有测绘图上进行精确标注和面积计算。最后通过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对不同类型的文件进行链接,进而对调查所获取的全部信息做进一步统筹分析与研究。

四、调查收获、认识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 调查收获

在两年调查的116.64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我们共发现采集区1250个,其中一般采集1016个,系统采集234个,采集区总面积约3.125平方千米,采集陶片数量39220片。根据我们对该区域范围内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的认识[20],可以将此次调查发现的遗存分为九组,归属于五个大时期。新石器时代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亦可划分为青铜时代早中期(小拉哈文化、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三组;魏晋隋唐时代的遗物发现较少且较为零散,故笼统地划归为一个时期;辽代和金代的遗存受调查材料所限,未做细分,将其划为一个时期;晚清至民国时期遗存为一个时期。两年的调查结果详见表一。

表一各时期调查结果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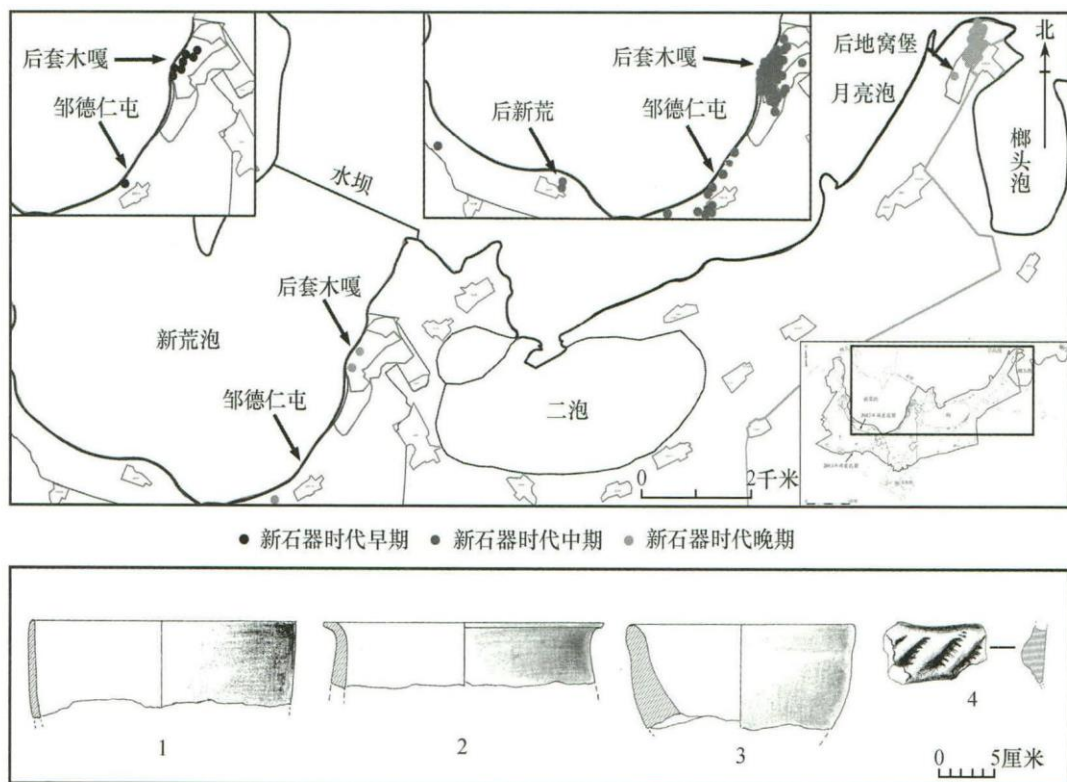
(二) 现有认识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现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结合以往工作和后套木嘎遗址近三年发掘工作的收获,已经具备了初步分析和研究的条件。我们通过对各个时期采集区在地图上分布情况的观察,尝试着探索该区域内不同时期聚落的形态、分布特点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

1. 新石器时代遗存

(1) 第一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迄今为止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即以夹炭陶为代表的遗存）的采集区共计9个，采集区面积2.25万平方米，共采集陶片19片（图二）。在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将以夹炭黄褐陶和灰褐陶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后套木嘎一期遗存，该类遗存的单位被后套木嘎二期即黄家围子类型的单位所打破，年代应不晚于黄家围子类型。该类遗存的陶片多为黄褐色或灰褐色，胎芯夹有炭化的草筋，有的器表饰有压印的柿齿纹，总体上看其制作工艺较为原始，具有陶胎厚、火候低、易碎等特点，具有东北亚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一般特征。综上，我们初步推测以夹炭陶为代表的遗存应是松嫩平原乃至东北亚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一〔22〕。



图二新石器时代采集区分布图与新石器时代中期遗物标本

1. 陶器（后套木嘎） 2、3. 陶器（邹德仁屯） 4. 陶片（后套木嘎）

从现有的调查结果看，我们发现该类遗存仅发现于新荒泡东南岸的两处遗址之中，即后套木嘎遗址和邹德仁遗址，两处地点均位于新荒泡东南缘的岗地上，在整个区域内地势相对较高，洮儿河水从西北部注入新荒泡，新荒泡的东岸、东南岸为相对地势较高且平坦的岗地，沿泡子边缘向西地势渐低，进而形成了新荒泡西部的成片的洪泛区，相较而言，新荒泡的东部、东南部则更适合人类的居住。遗址面朝新荒泡，濒临水域定居，除获取水源较为方便外，大面积的水域在特定的季节还可以提供丰富的鱼、蚌等食物资源。两个遗址之间相距仅约1千米左右，其中两个遗址中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采集区之间的距离约为2千米左右，在已发现的1250个采集区中，仅有9个采集区发现有该类遗存，其中邹德仁

屯遗址 1 个，后套木嘎遗址 8 个，可以发现该类遗存在现有调查区域内分布非常稀疏，且遗存分布面积较小，可见该时期的人类生产能力较低，活动力度尚小，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经济模式仍以对自然的攫取为主，而有限的自然资源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聚落的规模和人口的数量。

（2）第二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

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均以夹蚌粉的黄褐陶或灰褐陶为主，多为素面少量带指甲纹、戳印纹、刻划纹与单条圆钝附加堆纹的陶片可明确划归为以后套木嘎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遗存（即 2012 年简讯中的第二期）。素面的陶片中大多数也与后套木嘎第三期遗存特征相似，但少量素面陶片不排除有属于后套木嘎第二期遗存者（二者的部分素面陶片很难区分）。采集区共计 51 个，采集区面积 12.75 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 759 片（图二）。通过与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比较，并结合后套木嘎遗址第二期与第三期遗存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可将此组遗存的年代范围初步推定在距今 8000-5600 年前后。但主体遗存的年代范围应当在距今 6100-5600 年前后。

以现有调查材料看，该时期遗存主要分布于新荒泡的东南和南岸，属于该时期的采集区在后套木嘎遗址分布最为密集，邹德仁遗址次之，在新荒泡的南岸仅有少量分布，其分布范围大部分与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分布范围重合，可见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居民在居址的选择上与新石器时代早期居民趋同，故此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也多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居民所沿用，而其在新荒泡南岸的分布，也表明了该时期居民有向新荒泡的南岸活动的趋势；此外，从采集区的数量来看，该时期聚落的规模也大大超过新石器时代早期，可见该时期居民的活动能力和生产能力较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也有了新的发展。结合近三年的发掘资料来看，我们通过对浮选获得的植物遗存的分析，初步判断该时期已有农业的萌芽，然而在发掘过程中并未发现该时期有明确的农业工具，或许此时所谓的农业仍属于依赖对自然直接获取的季节性采集，而并未发展成为稳定的农业经济；通过对出土动物遗存的初步鉴定结果可知，该时期的动物皆为野生种。可以初步判断此时的经济模式仍以渔猎采集为主。

（3）第三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采集区 26 个，采集区面积约 6.5 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 431 片（图二）。该时期遗存以夹蚌红陶、夹蚌灰褐陶为主，器表多为素面，部分饰麻点纹和“之”字纹，属于后套木嘎第四期遗存，文化面貌与双塔二期及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遗存较为接近，大体与红山文化晚期年代相当。调查过程中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 26 个采集区中，23 个位于后地窝堡遗址，该遗址位于月亮泡与榔头泡之间伸入水中的狭长半岛前端，遗址地势较高，三面环水，仅西南部与开阔地带相连，系陆路的唯一通道；另于后套木嘎遗址发现有 2 个，邹德仁遗址仅发现有 1 个。表明现有调查区域内该时期的聚落中心已经由新荒泡东南岸向月亮泡东岸转移，从后地窝堡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亦可以看出，该时期居民选择居址的标准由之前单纯的择水而居变得更为复杂，除了更为接近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外，或许还兼顾到地理位置的防御功能。同时，三个遗址间距离的扩大，或许也说明了该时期居民活动能力的加强，单个聚落的经济域也随之扩大，同外界的交往能力也变得更强大。然而在现有区域内仅发现后地窝堡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说明此地该时期居民的生产能力仍非常有限，

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在其经济生活中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2.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存

(1) 第四组：青铜时代早中期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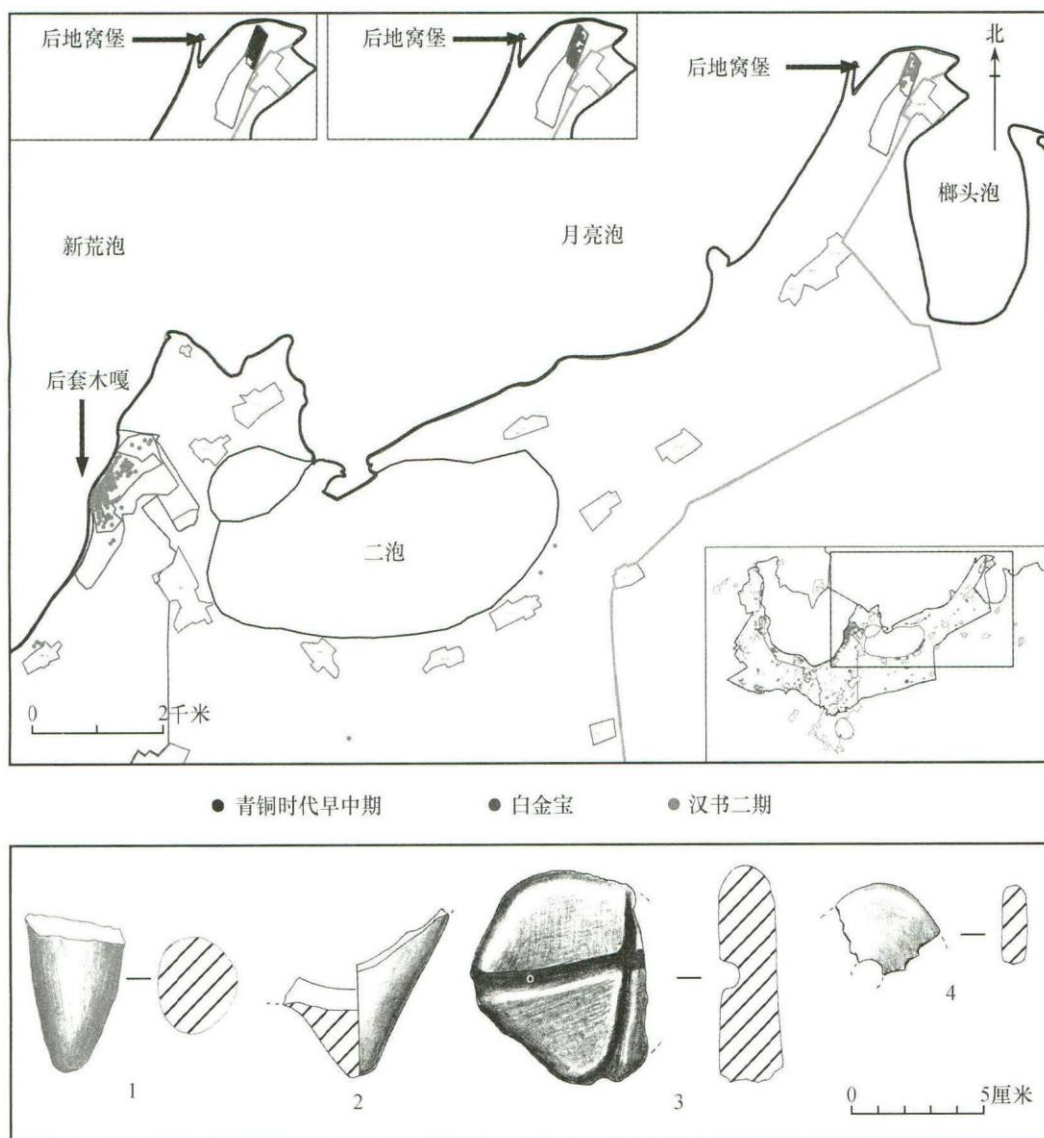
调查发现青铜时代早中期遗存的采集区共 48 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 12 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 1955 片（图三）。该时期遗存的陶片“以夹砂灰（黑）褐陶为主。素面居多。器表或打磨光滑或留有凸凹不平的手指凹痕。多见装饰性的乳钉和小泥饼。该特征与白金宝遗址第一期遗存十分相似，应为同一文化”[23]。学界称之为小拉哈文化。另有部分陶片“以砂质灰褐色陶片为代表。大多饰有纹饰，尤以绳纹和条形附加堆纹为多，绳纹细密规整，条形附加堆纹多饰于口沿下，也有少量组成简单折线的篦点纹，且压印痕较浅，这些特征与白金宝遗址第二期遗存相同。而高领罐、瓮的口沿，特别是花边口的鬲口沿与白金宝二期相一致。故该组遗存与白金宝二期一样，同为‘古城遗存，’[24]。

然而除带纹饰的陶片和器物口沿部分外，小拉哈文化和古城类型的相当一部分陶片区分较为困难，故此并不做细致划分，将其共同归为青铜时代早中期，这批遗存的时代大致在夏至晚商（图三）。在现有调查区域内该时期遗存仅发现于后地窝堡遗址，后地窝堡遗址隔榔头泡与月亮泡相连接处与汉书遗址相望，在汉书遗址的发掘材料中亦发现有属于青铜时代早中期的文化遗存，二者直线距离约

3.3 千米，尤其是在冬季冰封季节，通过冰冻的水面两个聚落联系更为方便。在距离较近的区域同时存在两个同时期的聚落，说明此时人群的生产能力已经大幅度提高，且两个聚落的关系应十分紧密。在黑龙江肇源小拉哈遗址亦发现有该时期的遗存，且该遗址连续性较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均存在，故此月亮泡周边的该时期遗存有可能是从肇源地区沿嫩江迁徙进入该区域。

(2) 第五组：白金宝文化遗存

调查发现白金宝文化遗存的采集区共 45 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 11.25 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 379 片（图三）。该时期的陶片多为泥质黄褐陶，泥质灰陶略少，另有少量的夹砂陶，器表均经过磨光，表面光滑细腻，陶器纹饰较为丰富，有压印的细密篦点纹构成的几何形和动物形纹饰，以及较为粗糙的绳纹。调查时还发现有少量石器，其中以穿孔的石锤斧最为典型。



图三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采集区分布图与汉书二期遗物标本
1、2. 鬲足 3. 网坠 4. 纺轮（均出自后套木嘎）

调查过程中发现有白金宝文化遗存的 4 5 个采集区中，其中 4 4 个位于后地窝堡遗址，后套木嘎遗址仅发现有 1 个，然而在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还发现有属于该文化晚期的墓葬两座。白金宝文化是以黑龙江省肇源白金宝遗址命名的，汉书遗址亦发现有这一时期的同类遗存，至少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该区域内白金宝文化的聚落主要是分布在月亮泡边缘的汉书和后地窝堡遗址，而后套木嘎遗址很有可能是白金宝文化晚期的人群选作墓地的开始，进而至汉书二期文化时代亦即战国至西汉时期发展成为一处规模较大的墓地。

（3）第六组：汉书二期文化遗存

调查发现汉书二期文化遗存的采集区共计 1 2 5 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 3 1 . 2 5 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 9 2 5 片（图三）。该时期的陶片多为沙质黄褐陶，少量的沙质灰褐陶，可辨器形有鬲、壶等，器表较白金宝文化的陶器略显粗糙，以素面为多，部分陶器表面施有红衣，陶鬲和陶壶的下部饰有绳纹，绳纹较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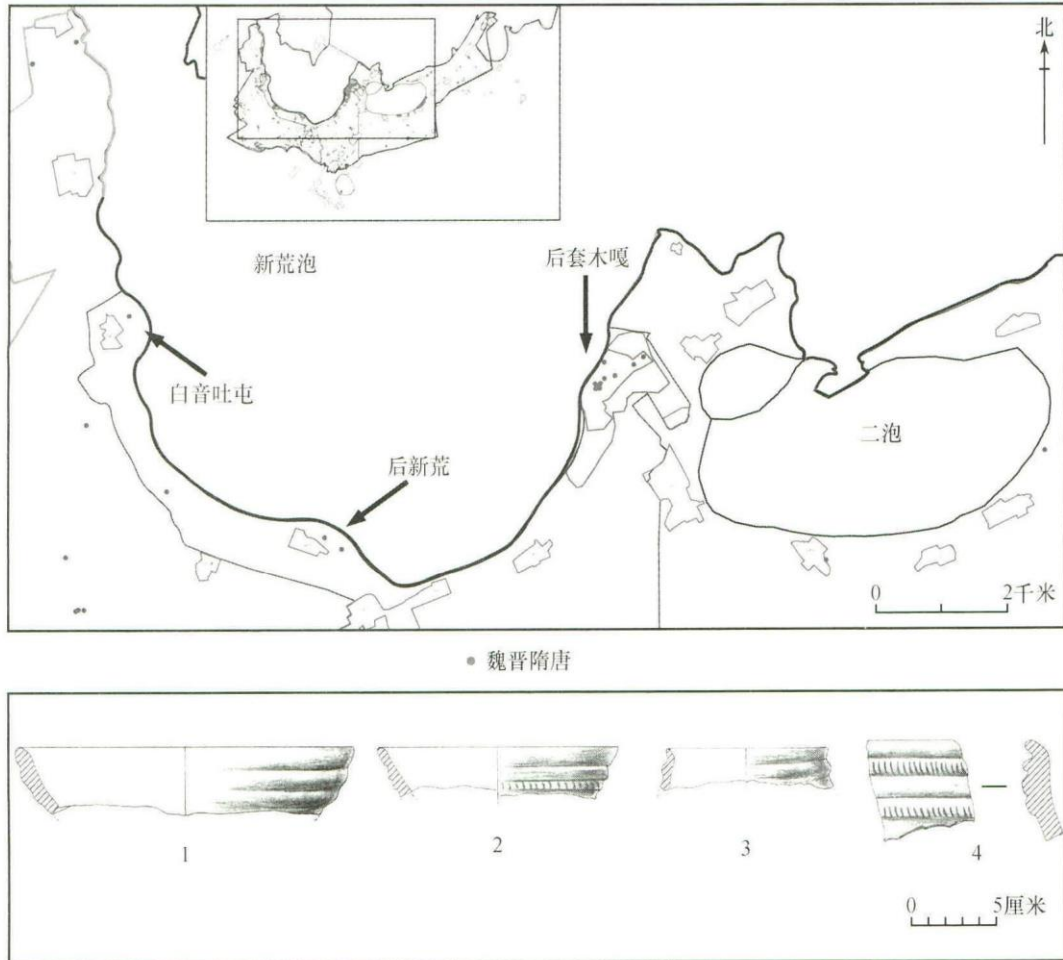
多呈线条状。另发现有陶网坠等。

调查发现汉书二期文化遗存的 125 个采集区中,其中 95 个位于后套木嘎遗址,后地窝堡遗址发现有 25 个,邹德仁屯遗址发现 3 个,二泡东南岸有 2 个,二泡南部较远处发现有 1 个。从采集区的分布和面积与之前青铜时代文化的对比观察,可以发现汉书二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有明显的扩大,然而其仍主要分布于后套木嘎遗址和后地窝堡遗址,其他地区分布较为零散,邹德仁屯遗址或许有可能是该时期的一处较小的聚落,而其他的采集区很有可能是该时期人群活动的遗留,至少可以说明该时期人群的活动范围较之前更大。通过 2011 至 2013 年连续三年的发掘,我们发现后套木嘎遗址属于汉书二期文化遗存的遗迹主要为墓葬,共发掘该时期墓葬约 70 余座,在该时期,后套木嘎遗址中部是作为该文化群体的一处公共墓地而存在的,墓葬内出土的陶器多系施红衣的陶壶和陶钵的组合,这种红衣陶器主要是作为冥器使用的。而调查时在后套木嘎遗址范围内发现的大量的沙质黄褐陶有些明显是属于聚落日常使用的实用器的残片。汉书二期文化的墓地和聚落同属于一个大的遗址范围内,且相去不远。在以往考古工作收获和认识的基础上,可知战国至西汉时期在新荒泡和月亮泡区域,至少存在有东山头遗址、汉书遗址、后地窝堡遗址、后套木嘎遗址四个规模较大的聚落和墓地。

3. 第七组: 魏晋隋-唐时期遗存

调查发现魏晋隋唐时期遗存的采集区共 23 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 5.75 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 40 片(图四)。

该时期遗存的陶片主要为夹砂陶,分为红褐陶和灰褐陶,陶器近口沿处多有三道凸棱。该类遗存与鲜卑或契丹早期的陶器特征较为接近。鲜卑族起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东北部,当其走出“大鲜卑山”踏人草原时,也预示着其主要的经济模式由原有的渔猎经济转型为相对发达的游牧经济,以游牧为生的鲜卑族活动地域也随之扩大,其完全可以沿嫩流而下,越过大兴安岭,由呼伦贝尔草原进入松嫩平原地区。契丹族为隋唐时期活跃于东北亚地区的游牧民族的一支,历史学界认为其源出东胡,松嫩平原毗邻科尔沁草原,新荒泡及其附近的湿地范围水草肥美,其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则更适于游牧经济的发展,契丹族亦完全有可能游牧于此。也正是受到该时期经济模式的限制,该时期此地并不存在相对稳定的定居聚落,故此发现有该时期遗存的采集区较为分散,其沿新荒泡及隶属于月亮泡的二泡周边均有零散分布,极有可能是游牧民族在迁徙过程中或短暂停留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存,沿泡子南岸的一线,或许正是当时游牧民族的迁徙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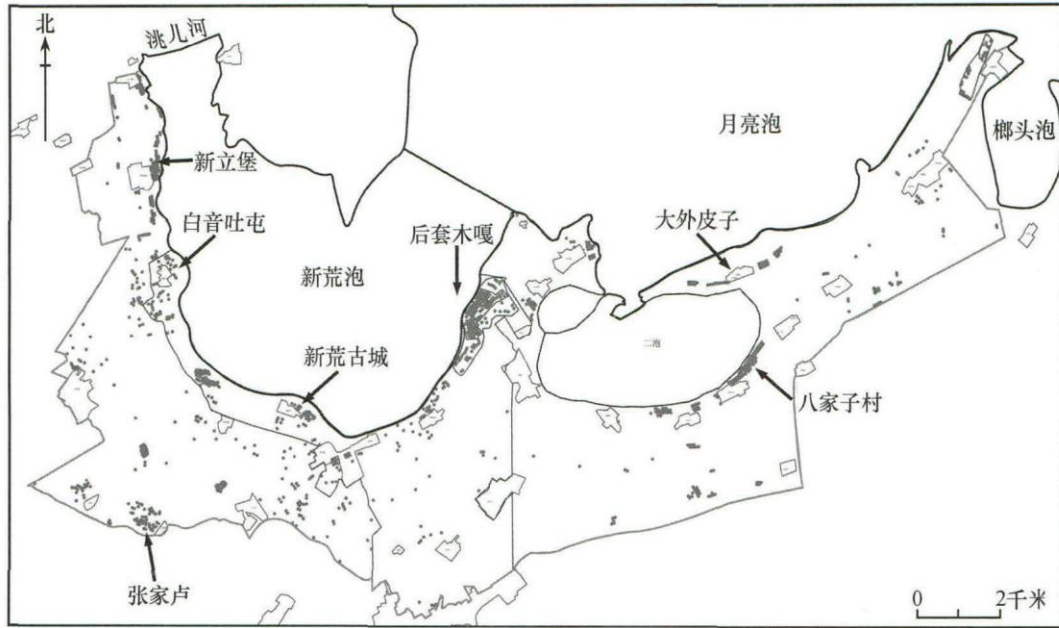


图四 魏晋隋唐采集区分布图与遗物标本
1 - 4 . 口沿 (后套木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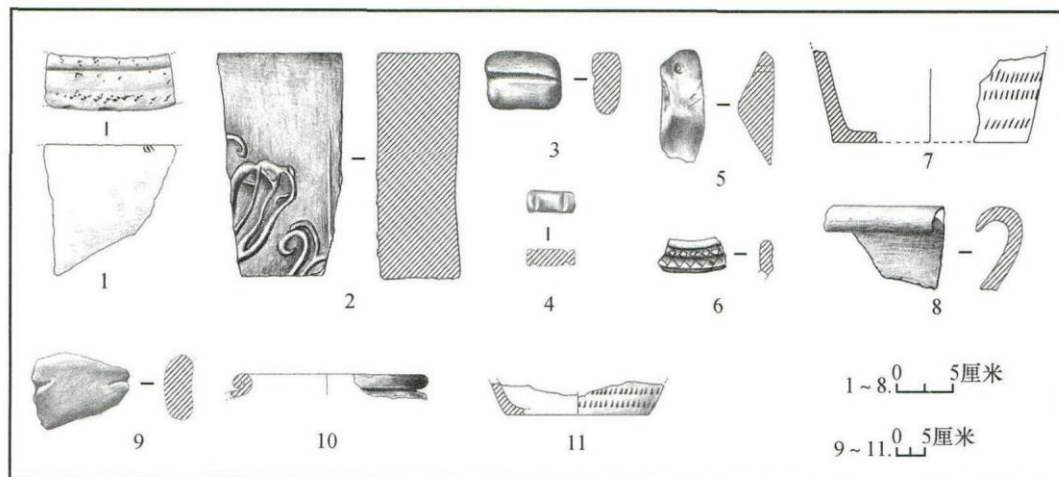
4. 第八组：辽金时期遗存

调查发现辽金时期遗存的采集区共 1 0 8 0 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 2 7 0 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 2 1 7 6 9 片（图五、图六）。

无论是从采集区的数量、面积，还是陶片数量来看，可以发现该时期的遗存非常丰富，除大量的陶器残片外，还发现有砖瓦类的建筑构件陶片多为泥质灰陶，发现的器物口沿多为卷沿或折沿，以素面为多，少量器表经磨光，可见纹饰有篦齿纹、垂帐纹、戳印 5 角形纹等。建筑构件发现有板瓦、筒瓦和青砖残块，均为泥质灰陶，瓦类构件内面印有布纹。其中部分瓦类构件的残块又经再次利用，被改造成网坠使用。



图五 辽金时期采集区分布图



图六 辽金时期遗物标本

1. 瓦片（新立堡） 2. 花纹砖（尹家窝堡） 3、4、9. 网坠（后套木嘎、八家子、后套木嘎） 5. 砺石（永丰） 6. 陶片（永庆） 7、11. 器底（永丰、邹德仁屯） 8、10. 陶器口沿（尹家窝堡）

辽金时期遗存在现有调查范围分布较为均匀，聚落间的距离均在3千米左右，这种分布状态很可能与古代的道路交通网状系统有关。现有调查区域来看以新荒泡的沿岸分布更为集中，后套木嘎遗址、邹德仁屯遗址、新荒古城及周边、尹家窝堡西北、白音吐屯附近、新立堡遗址等，各个遗址在新荒泡沿岸的均匀分布，更像是现有区域内的一条主要通道。其向南辐射的线路如尹家窝堡西北遗址到小金山遗址和张家卢遗址的距离也在3千米左右。月亮泡沿岸的大外皮子遗址和二泡东南岸的八家子遗址的间距也符合这个规律。若将这种聚落间的分布状态放在一个更大的交通网状系统之内，或许这种规律性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当然这也期待

日后的工作能进一步证明这种推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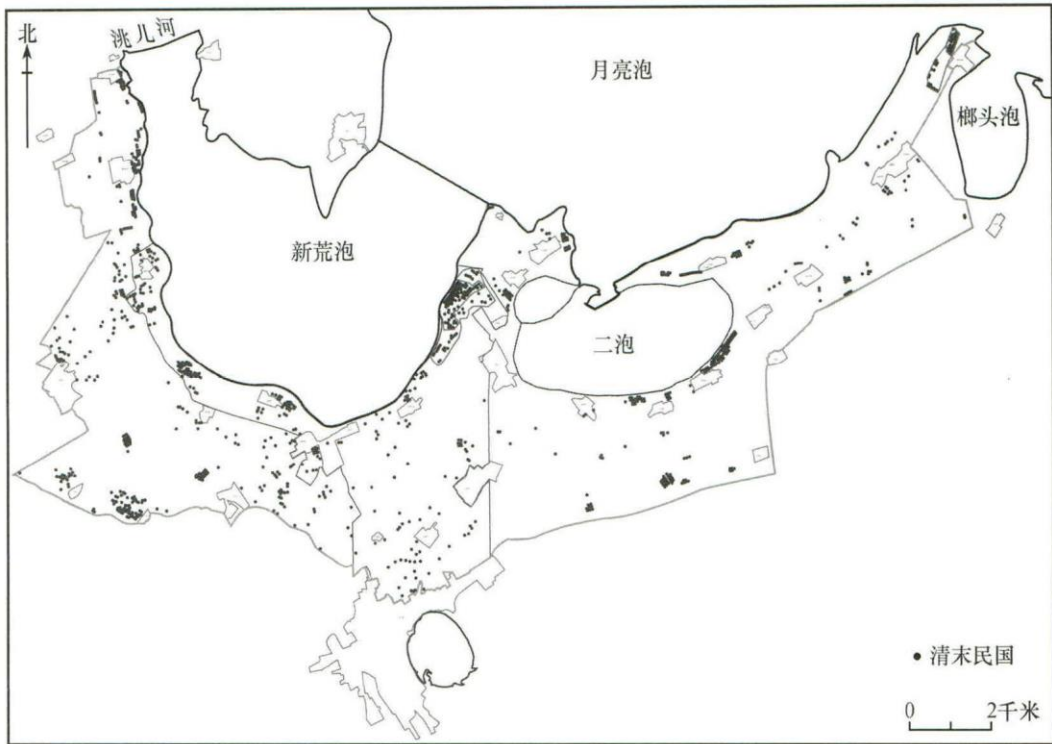
从聚落规模观察，后套木嘎遗址辽金时期遗存的分布面积略大，可见该区域从新石器时代至辽金时期始终是人们择选聚居地的最优之选，且在遗址的南部还发现有铁渣、烧结的炉壁等冶铁遗存，可见该区域在功能区分上极有可能为冶铁作坊。新荒古城系辽金时期的一座城址，调查时发现古城所在位置已为现代村落所占据，现仅存在卫生院东和小学校北的一小块空地，古城的轮廓已经完全无法辨识，据《大安市文物志》记载，“新荒古城为方形，周长792米，东西城墙居中位置各有一门”，受当地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影响，原有地貌破坏十分严重，所发现的遗物不多，有少量的泥质灰陶片、辽代白瓷片等；尹家窝堡西北发现的辽金时期的遗存紧邻新荒泡，通过对地貌的细微观察，发现北侧濒临泡子的一线地表有几处较高的隆起，且排列较有规律，2014年我们对其中的一座土包进行了试掘，发现了辽金时期土盐制作遗存，可知尹家窝堡遗址是该区域内辽金时期盐业生产相关的一处遗址；白音吐屯亦发现有大量的辽金时期陶片，其散布面积较大，并不十分集中，可能为一处长期居住或季节性居住的聚落；新立堡遗址位于新荒泡的西岸，呈南北向的条带状分布，地表散布有大量辽金时期的遗物，除陶片外，还发现有砖瓦类建筑构件的残块，《大安市文物志》则将其定义为一处辽金时期的建筑址。新荒古城、尹家窝堡西北、白音吐屯附近及新立堡遗址从地理位置及出土遗物上来看或许更应该属于一个大的整体，尹家窝堡西北和新立堡遗址从瓦类建筑构件的发现来看，其等级相对较高，而新荒古城系该调查区域范围内的唯一一座辽金时期的城址，虽然其规模较小，然其所处的位置较为重要。据《辽史》记载辽代有四季捺钵的制度，依四季编排分别为“春水、夏凉、秋山、冬坐”，其中的“春接钵”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很有可能是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而并非单只一处，新荒泡沿岸很有可能也属于辽代皇帝春季捺钵地域范围内的一部分。

5. 第九组：晚清至民国时期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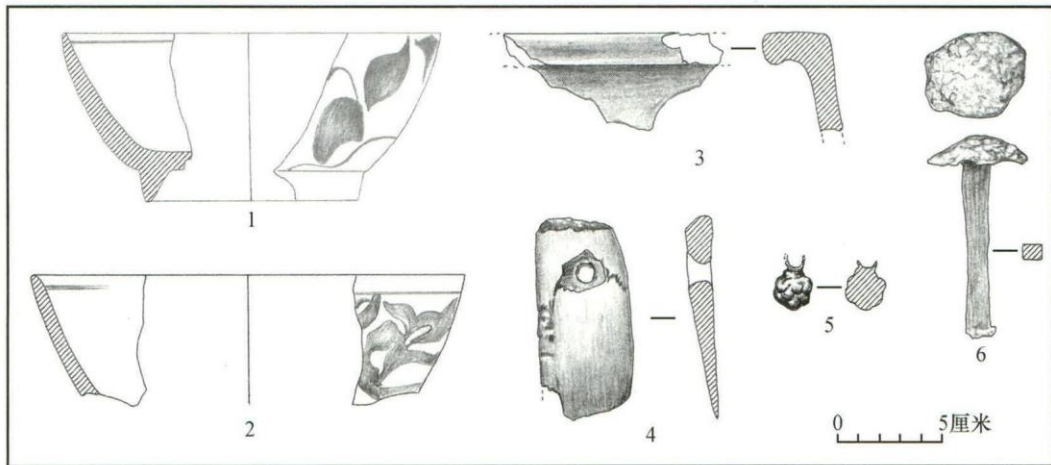
调查发现有晚清至民国遗存的采集区共1105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27

6.25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12953片（图七、图八）。

该时期的遗存亦十分丰富，发现有大量的陶瓷器残片，陶片多为泥质灰陶，火候较高，质地更为细腻，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陶器可辨器形多为陶盆，陶盆口沿多为小折沿、尖圆唇，剖面近三角形。瓷片多为青花瓷片，多为晚清至民国时期，瓷胎灰白，略显粗糖，釉色透明，多数为花卉纹，青花色彩灰暗。另发现有少量的青砖和纹饰砖等建筑构件。



图七 晚清至民国时期采集区分布图



图八 晚清至民国时期遗物标本

- 1、2. 瓷碗（张家卢、后套木嘎） 3. 陶器口沿（后套木嘎） 4. 砺石（永丰） 5. 铜扣（洮儿河） 6. 铁钉（白音吐屯）

从现有的调查结果观察，该时期遗存的分布范围与辽金时期遗存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仅在安广镇的北侧较辽金时期遗存分布范围略广。将之与辽金时期遗存分布范围图对比，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一是有该时期遗存分布的地域，辽金时期遗存均有发现，可以说明从辽金时期开始，至少在金代及其以后该区域人口的分布情况相对稳定；二是该时期遗存多分布于现代村落附近，有些甚至直接叠压于现代村落之下，可以说明现代村落至少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已经初步成形，民国时期这个区域已经形成了以安广镇为中心的行政地域单元。然而通过陶片密度的对比我们发现其实二者具有显著的差异，辽金时期在新荒泡的南岸均匀分布有许多小的聚落中心，在内部具有向心性，彼此之间距离较为接近，便于交往和贸易；晚清至民国时期遗存分布密度整体较为均衡，其在新荒泡南岸的分布情况较辽金时期差别明显，向心性又彼此交往的小的聚落群已经不明显，说明新荒泡南岸这一区域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重要性较辽金时期有所降低，或许这一变化恰好与安广镇此时逐渐形成区域中心有某种联系。

五、结语

通过两年的工作，我们初步掌握了现有调查区域内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清民国时期遗存的分布状况，为研究该地区聚落形态特点和历时演变规律提供了基础资料。从现有调查资料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该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采集区数量很少，在已调查的116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仅于新荒泡东南岸的两个遗址之内有所分布，相比较而言后套木嘎遗址更为集中，目前而言尚无法推断其为永久聚落还是季节性聚落，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择高临水而居的特点。地表采集该时期陶片的数量非常少，仅占陶片总数的0.04%，尽管人口数量暂无法判断，但可推知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非常少，区域内的人口密度极低。对比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采集区的数量、陶片数量以及密度，都有显著的提高，说明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有所提高，聚落规模有所扩大，但从采集区分布来看，其较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基本的择居的标准并未发生变化，虽然后套木嘎遗址的采集区数量和陶片数量及密度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不同地点的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有所差别，但还无法反映不同聚落在等级上是否存有差别。根据柯睿思（Christian Petersen）和吕学明等在大凌河上游地区的调查研究可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聚落之中已经出现有聚落等级的差别，围绕“核心区”的众多“地方社区”组成一个超地方社区，说明此时的社会结构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再看我们的调查区域内，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可以发现该时期遗存大量分布于后地窝堡遗址内，有一种可能是在月亮泡沿岸已经出现了一个中心聚落—后地窝堡遗址，此时的后套木嘎遗址则屈居于从属地位。再看后地窝堡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或许也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一种反映。总之，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聚落规模而言，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内，整体上是趋于缓慢发展的，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许在社会结构上有所变化，但这还需要更多的工作去验证。青铜时代早中期的遗存其实包含两个阶段，虽然我们未做细分，但从统计数据观察，其较新石器时代晚期有缓慢发展，但变化不大，其实这种现象一直贯穿到早期铁器时代。且其选择居址的标准较新石器时代并无太大差异，然而其重心已经从新荒泡转移到月亮泡沿岸，与嫩江上游联系更加紧密，这或许也是使用早期文化的人群沿嫩江而下进入该区域的一种反映。至魏晋隋唐时期，从采集区数量、陶片数量和密度来看似乎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一次较大的倒退，然而从历史角度审视这个问题，可知这一期生活在该区域内的人群的经济模式已经有所变化，而这种调查方法的统计结果，X寸分析发达游牧文化群体人口数量和社会复杂化进程并不适用。在现有调查区域内，至辽金时期无论是采集区数量，还是陶片数量和密度与同区域的前期情况相比是一次不小的飞跃，大大小小的聚落在调查区域内大量分布，这一时期定居人群与青铜时代的择居标准发生较大变化，人们不再单纯的择高临水而居，而是分布于更广阔的平原旷野的各个部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方式,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这也是导致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和聚落数量得到了空前膨胀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一区域内辽金时期的峰值和元明时期的真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因为我们在调查资料的整理过程中并未发现明确属于元明时期的遗存,很可能在王朝更迭后,区域内生活的社会群体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其主体人群仍旧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惯性,反映在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上则较为困难。晚清至民国时期聚落与现代村落分布状况相差无几,现今区域内行政区划格局在这一时期已基本成形。

通过两年的调查我们对这一区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但要做更为深入的分析,仍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故此,我们拟于未来的几年中,将调查范围扩大至西北至洮儿河、东北至嫩江南岸以及新荒泡及月亮泡北部,在完成300平方千米任务的同时,还计划选择不同时期的重要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工作,进一步探明区域内聚落的历时性发展规律和内在动因;青铜时代人群进入这一区域的迁徙路线;并尝试开展不同时期聚落等级化分析(“位序—规模”分析)、不同时期人口的统计分析、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交往频繁程度和交流交换线路等问题;同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结合环境条件如土壤、地形,以及河流河道、湖泊范围的变化等进一步探索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最后,如有可能可以跟赤峰、喀左、彰武、阜新等同样使用区域性系统调查区域的数据和成果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探索更大地域范围内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和共同规律。

附记:

“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周边300平方千米区域性系统调查”系吉林省文物局委托项目“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考古工作规划”和吉林大学“GIS支持下的吉林省古代聚落历时态考察”项目成果内容中的一部分,项目领队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立新教授,2012年参与调查人员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付琳,硕士研究生雷长胜,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晓轩、刘晓溪,大安市博物馆梁建军;2013年参与调查人员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霍东峰,博士研究生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林森、付琳、王涛、杨琳,硕士研究生刘晨、胡平平、于超、袁媛、何菲菲,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晓溪,大安市博物馆梁建军,白城市博物馆王浩宇。本文地图由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绘制,器物图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新胜完成。

注释

[1] 王立新,霍东峰,石晓轩,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2-8-17(8).

[2] 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地区系统区域调查的新收获[J].考古,2002(5):10.

[3] 方辉.对区域系统调查法的几点认识与思考[J].考古,2002(5):56.

[4] 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A].梁思永考古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58-90.

[5] 黑龙江省博物馆.嫩江下游左岸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1960(4):15-17.

- [6] 黑龙江省博物馆.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J].考古,1974(2):99-108.
- [7] 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1):80-82.
- [8]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大安县洮儿河下游右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考古,1984(8):688-697.
- [9]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靶山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8(12):1072-1084.
- [10]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镇赉县黄家围子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8(2):M1-156.
- [1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黑龙江省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8(1):61-101.
- [12] 张忠培(主编),朱永刚(撰稿).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R].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 [13]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A].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36-140.
- [14]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J].考古学报,2013(4):501-538.
- [15] 李莲.吉林省安广县永和屯细石器遗址调查简报[J].文物,1959(12):37-40.
- [16] 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1):80-82.
- [17]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A].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36-140;2001年的发掘材料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18] 王立新,霍东峰,赵俊杰,刘晓溪.吉林大安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址[A].201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7.
- [19] 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刘晓溪.后套木嘎遗址田野数据库的建设[A].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89-102.
- [20] 王立新,霍东峰,赵俊杰,刘晓溪.吉林大安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址[A].201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7.
- [21] 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资料最新研究成果将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四期,调查结果中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材料实际涵盖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由于调查采集陶片标本多为素面且较破碎,不宜细分,故统归于新时期时代中期。而该区域青铜时代早中期文化之间具有明显的传承性,而采集到的该时期陶片标本以素面为多,难以准确细致断代,故该部分材料亦不刻意区分。
- [22] 王立新,霍东峰,石晓轩,史宝琳.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2-8-17(8).写作该简讯时2011年发掘区的大部分探方尚未清理至底,此后在整理过程中又辨识出一种以器表装饰多条平行窄细附加堆纹为特征的遗存,年代介于简讯中所分的第一期与第二期

之间。遗存面貌与以往命名的黄家围子类型相似，与昂昂溪遗址采集部分遗物的特征也基本相同，但不宜归入内含混杂的昂昂溪文化。

[23] 王涛, 杨琳, 王立新. 吉林大安市后地窝堡遗址的调查与认识[A]. 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9-28.

[24] 同[23]

[25] Christian, E. P., Li, Xueming. Understanding Hongshan Period Social Dynamics [A]. 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chaeology [C]. Wiley-Blackwell, Chichester, 2013: 55-80.

Preliminary Report on 2012-2013 Seasons
of Systemic Regional Survey in Da'an, Jilin
Province

The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Da'an city, Jilin province, is pa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of Houtaomuga site in Da'an city, Jilin province. A 300 km² full-coverage survey has been planned around the Xinhuang and the Yueliang lakes in the lower course of the Nen River valley.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tools for settlement archaeology. During the 2012 and 2013 seasons, the surveyed area already reaches about 116 km². At this stage of the project, the general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already appears inside the covered area, and allows us to initiate the analysis of the diachronical evolution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as well as reflection on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environment. Meanwhile, the planning and goals of the future work can thus be determined with higher expectations.